

基督徒的使命與培育

從「人與自然連結」相關理論闡釋

吳雯菁¹

本文綜合略述「人與自然連結」相關的理論發展，並將之整合於基督信仰、特別是《願祢受讚頌》中對人與自然關係的描繪，期能藉由信仰培育重建人與自然的連結。

一、重新連結人與自然的迫切性

第一年開始在中學教書的時候，我陪伴一個住宿生小團體。有天晚上興致勃勃地跟學生們說，想帶她們到鄰近公園看螢火蟲。我以為孩子們會和我一樣興奮雀躍，沒想到好幾個學生舉手：「我們可以去超商買東西嗎？」「可不可以去有冷氣吹的地方？」

另一個典型而同樣讓我感到意外和難過的例子是，去年在一個由高二、高三女學生組成的團體中，請成員們分享一個「和大自然互動的經驗」、不論是開心的或是不舒服的都可以，像是去野外郊遊或是養寵物等等。沒想到這個平常發言很踴躍的小團體居然沉默了。等了一會兒，第一個開口的學生說起她看

¹ 本文作者：吳雯菁，耶穌孝女會修女，現任教於天主教達人女子高級中學，並於台灣大學森林所環境教育研究室在職進修博士班。

電影 *Moana* (海洋奇緣) 的心得；第二位女孩接著分享另一部海洋保育的電影；第三個學生提到一本書，其中談到人和環境關係的改變.....。「等等，」我說，「妳們分享的電影和書都很好，但能不能說說妳們自己的經驗呢？」一個平常總是主動發言的孩子撓了撓頭，低聲說：「我們都在都市裡長大，好難想起跟大自然互動的經驗喔」。

日益疏遠於自然，似乎是這時代孩童的特徵。由於跟自然缺乏連結，環境行動成爲一種道德性的義務，而非從情感自然流露出的切身關懷。2008年，由耶穌會社會正義與生態秘書處編集出版的《治癒受破壞的世界》(*Social Justice and Ecology Secretariat*) 書中，論及關懷環境：「首要及最終的是認出環境是真正的善，並以讚賞、也就是一種默觀性的方式回應。缺乏這種讚賞，任何的倫理責任對我們都成爲次要的、甚至是壓力」²。

五年後，教宗方濟各以《願祢受讚頌》爲題，頒布以環境關懷爲主題的通諭。雖然《願祢受讚頌》常被冠以「環保通諭」、「氣候變遷通諭」稱號，然而通諭對「環境」範疇的界定卻不侷限於自然生態，而是從更廣泛的整體生物圈與人類社會相依相存的角度進入，將生態危機的根源拉回「人」的本質課題。因此，美國聖母大學環境法學教授 John Nagle 認爲，《願祢受讚頌》與其說是「環保通諭」，不如稱爲「人性通諭」(an encyclical

² Patxi Álvarez, S.J. ed. (2011), *Healing a Broken World* (Rome: Social Justice and Ecology Secretariat. 2017, June 24), <http://www.sjweb.info/documents/sjs/pjnew/PJ106ENG.pdf>

about humanity)。也就是說，面對環境問題，不可僅從「問題解決」的角度來思考，必須回到更深層的人的生命意義的根源，重新省思人與環境的關係，回到面對自然萬物時那「讚頌」的態度，從情感出發，由衷地維護。

因此，在人類生活日益遠離自然的今日，恢復「人與自然的連結」是重新展開環境關懷的第一步。而「與自然連結」究竟具有什麼樣的意義？可以如何發展培養？本文將藉由回顧生態心理學與環境教育相關理論，整理當前學界仍在發展中的「與自然連結」（connected with nature, CWN）以及環境認同相關理論，希望能對今日基督徒的環境使命以及培育所有啟發。

二、人與自然連結的相關理論發展

（一）人與自然關係的斷裂

2005 年時，創辦「兒童與自然網路」的美國記者 Richard Louv 集結他多年來的觀察研究與訪問，出版《失去山林的孩子》（*Last Child in the Wood*），用「大自然缺失症」（nature-deficit disorder）這類比於醫學診斷的詞彙，描述現代人疏遠自然後產生的各種身心現象，如感覺遲鈍、注意力不集中、好發生理和心理疾病等等，藉以呼籲家長與教師帶領孩童回歸自然、親近山林。

Louv 借用歷史學家 Frederick J. Turner 的邊疆理論（Frontier thesis）來描述美國新一代與未來青年對自然的看法。在 Turner 的理論中，「邊疆」在美國歷史的不同時期有不同的意義脈絡：

- 「第一邊疆」是西部開發的年代，當時「邊疆」意指「野

蠻與文明的交會點」；

- 直到二十世紀初期開始進入「第二邊疆」，男孩與女孩們夢想成為童軍、在草原上建立自己的堡壘，沉浸於馴化和浪漫化的荒野中，是「郊區和荒野」的年代。依據 Turner 的調查，嬰兒潮一代（出生於 1946~1964 年間）可能是將土地、溪流視為精神家園的最後一代。
- 如今，「第三邊疆」形成，雖然還無法確定新式邊疆的樣貌，但 Louv 認為已經浮現幾種明顯的趨勢特性：以知識而非體驗的方式理解人與自然間的關係；不知道食物從哪裡來；機器、人與動物之間的區別開始變得模糊，甚至生命本身的定義也開始不明確。Louv 總結指出：這些「第三邊疆」的趨勢明顯反映出我們的兒童正在經驗一個「去自然化」的過程，並且這趨勢不僅出現在美國、更是全球性的³。

關於這去自然化的過程，保育心理學者 Matthew J. Zylstra 與他的研究團隊在綜覽近數十年間的相關研究後，將人與自然關係斷裂的驅力分為初時歷史性的，以及持續性的心理及物理因素。

- 初時歷史性的心理趨力，包括語言上的主詞賓語分立結構、猶太與基督宗教中人與自然對立的神學詮釋、理性主義及與笛卡爾的心物二元論、科學主義以及對宇宙自然的祛魅等；歷史性的物理趨力則如殖民主義與統治者邏輯、

³ Richard Louv 著，郝冰、王西敏譯，《失去山林的孩子：拯救「大自然缺失症」兒童》（台北：野人文化，2014），39-45 頁。

工業革命及進步主義、從農村到城市的人口遷移、對食物來源的異化、對自然的消費性使用、對抗疾病、瘟疫與極端氣候等歷史事件。

- 在持續至今的因素部分，Zylstra等人則列舉了主客二元論、受限的自我概念、信息與感官的超負荷、環境麻痺、普遍性的環境健忘（Environmental generational amnesia）等心理因素；以及物理因素，如爆炸性的人口增長、城市化的規模、建築環境的設計與開發不良、對動物的剝削和遠離、自然經驗的滅絕、市內久坐式的娛樂等⁴。

無論是Louv或Zylstra的研究團隊，都強調現今過量的訊息負荷，已造成人們「感官的日漸萎縮」⁵。由於整日曝曬在各種媒體資訊的刺激中，現代人傾向於將感官聚焦在特定對象，忽略背景與環境訊息，這種注意力無法集中的「自然盲目」（Inattention nature blindness），加劇了人與自然關係的疏離。

在《失去山林的孩子》一書中，Louv憂心這樣的資訊洪流將淹沒人們探索智慧的好奇心，遺失我們藉由感官來體驗生命訊息的重要能力，而這種感官的空洞、孤立與圍堵，最終將延伸出「文化自我中心主義」⁶，生活日益限縮於各種 3C 架構出

⁴ M. J. Zylstra, A. T. Knight, K. J. Esler, & L. L. Le Grange, "Connectedness as a core conservation concern: An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 of theory and a call for practice", *Springer Science Reviews*, 2:1~2 (2014), pp.119~143.

⁵ Richard Louv 著，《失去山林的孩子》，73 頁。

⁶ Richard Louv 著，《失去山林的孩子》，73、80~83 頁。

的世界，不僅遠離自然、也疏遠於與他人的接觸。

在《失去山林的孩子》出版的十年之後，教宗在《願祢受讚頌》通諭中，也同樣提醒我們留意當代世界的科技邏輯，以及媒體資訊洪流對人際、人地關係的影響。教宗的敘述雖是為提醒數位媒體的使用，卻也可說是一種間接的關於「大自然缺失症」的描述：

「當媒體和數碼時代變得無處不在，其影響力可阻礙人學習如何有智慧地生活、作深度的思考，及慷慨大方地去愛。……與他人的真正關係和其中所隨之而來的挑戰，現在已趨向由互聯網路的交流所取代，人可以在眨眼間選擇或刪除彼此關係，於是形成一種渴求得到的虛擬化情感，是從器材和螢幕得到的情感，與他人和大自然無關。雖然今日的媒體確實可助人互相溝通，作知識和情感上的交流。然而，有時媒體會遮蓋我們，使我們不必直接接觸他人的痛苦、恐懼和喜樂，也毋須直接面對他們複雜的個人經歷。⁷」

（二）建構生態認同——恢復人與自然的連結

其實，早在《失去山林的孩子》一書出版的前十年，生態學與心理學界便開始有多位不同專長的學者，紛從各自關懷的領域出發，嘗試連結自然生態與心理、人格發展的歷程。這些跨領域的研究後來被廣泛地通稱為「生態心理學」，其中生態

⁷ LG 47.

本位的學者多從環境進路出發，指出為治癒人們某些非理性的環境惡習，應當在環境保育的脈絡下重新定義心理健康的意義；而從心理學本位出發的研究，則期盼走出既往心理學對「主體」研究僅聚焦於內在性（interiority）的限制，期能將主體重新置於世界之中，甚至將主體轉換為世界。

早期環境教育學者大多相信只要人具備相應的環境知識，就能對環境問題採取適當的行動。但在這一波生態心理學的研究展開後，部分環境教育學者也嘗試擴充「環境教育」的核心關懷，企圖從整體人格發展的歷程來看「環境」在人的自我認同建構過程中的角色，以及這對於人與自然環境關係的影響。

哥倫比亞學者 Lucie Sauvé⁸ 便定義環境教育的目標在於培育「成爲在地球上的人們」（Being humans on Earth），她用複數人稱來強調「成爲人」（being humans）必然是一趟集體的旅程，由共同居住在一個地區的人們，經過夢想、渴望、掙扎的歷程，尋找意義與價值，編織共同的文化。也就是說，從社會心理發展的角度來看，如何看待自己與環境或自然世界的關係，會影響並形塑人對自我身分的理解與認同。因而當代許多看重發展歷程的環境教育或生態心理學者，均肯定環境教育必須協助個人發展環境或生態認同（environmental identity/ecological identity）。

環境認同被定義爲「人關連於環境的自我意義」（the meanings

⁸ L. Sauvé, "Being here together", in M. McKenzie, P. Hart, H. Bai & B. Jickling (eds), *Fields of Green: Restorying Culture, Environment, and Education*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 2009), pp.325~335.

that one attributes to the self as they relate to the environment)⁹，它既對環境行為產生直接影響，又通過環境態度產生間接影響。美國人類學者 Dorothy C. Holland¹⁰ 與她的工作夥伴在長期研究人們生命週期中深化或重構自我身分意義的關鍵時刻之後，肯定除非人將保護與改善環境的使命納入其身分認同，否則無法持續地投入環境關懷。他們從文獻與研究訪談中歸納出，隨著投入環境行動的歷程逐步加深，人與環境的關係會產生三次主要的變化：首先是增加對外在自然世界的覺知、逐漸意識到環境問題；其次是開始認同並願意承擔環境行動、關心行為後果；最後是能連結其他的參與網絡，並在實踐中持續學習。這些變化未必是線性的，也能夠重疊循環或相互置換。

如何發展環境或生態認同，和恢復「人與自然的連結」(connectedness with nature, 縮寫為 CWN) 有密切的關係，在生態心理學與環境教育研究領域裡，這兩概念(環境/生態認同和 CWN) 常被連結在一起使用。2014 年時，Matthew J. Zylstra 等人彙整近年來關於與自然連結的研究文獻，總結指出「與自然連結」包含認知、情感與行為三個維度：

- 認知維度：如自然的感知、知識、信仰，及其與自我意識

⁹ J. E. Stets & C. F. Biga, "Bringing identity theory into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Sociological Theory*, 21 (2003), pp.398~423.

¹⁰ W. Kempton & D. Holland, "Identity and Sustained Environmental Practice", *Identity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edited by S. Clayton and S. Opatow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3), pp.317~341.

的關係：

- 情感維度：含括自然的感受和情緒；
- 行為維度：指涉人在自然中的行動與經歷。

這三維度彼此交互影響¹¹。早期，關於CWN的討論多聚焦在認知的維度上，主張提供環境資訊、加強環境知識，可以促進人們在環境關懷上的承諾與實踐；但也有越來越多學者肯定人與自然的情感聯繫，是促成環境行動的核心趨力。

Zylstra團隊認為，與自然連結（CWN）是一種穩定的意識狀態，包括與自然共生的認知、情感及經驗特徵，並能藉由一致的態度與行為反映出自我和大自然之間的持續性連結¹²。儘管Zylstra等人強調任何試圖對CWN做出明確和固定的定義，都可能是過於理想、甚至可能是傲慢的，但我們仍然可以捕捉出一些關於CWN的重要內涵；不僅僅是簡單的接觸或膚淺的自然享受，卻是對所有生命的內在價值和共同本質的持久欣賞；超越了享樂主義、物種保護主義和功利主義，表現出願意尊重並能夠承擔起保護自然的責任。

（三）與自然連結的生命經驗研究成果

為建立人與自然的連結關係，需要一個長期累積的過程，無法只憑單次性的課程或工作坊就能宣稱達成目標。因此，當

¹¹ M. J. Zylstra, A. T. Knight, K. J. Esler, & L. L. Le Grange, "Connectedness as a core conservation concern: An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 of theory and a call for practice", pp.119~143.

¹² *ibid.*

前學界關於人與自然連結 (CWN) 的研究，多藉由訪問長期關懷環境或環境運動團體成員的生命歷程，以生命經驗回溯的方式抽譯出重要的關鍵性因素。在這方面，美國Colorado Boulder大學教授Louise Chawla和她的研究團隊累積了長期研究的豐富成果。她們發現，為成爲一位能夠關照環境的負責任行爲者，最重要的影響因素有二：首先是身邊重要他人的影響；另外便是具有在自然界中游戲或娛樂的積極體驗¹³。

以下參考 Chawla 等人歷年來發表的文獻，並對照 Holland 團隊關於社會環境認同發展的研究，簡單摘要爲兩個層面：1. 兒童青少年時期的自然環境經驗；以及 2. 重要他人與社群的影響，其中兒童青少年時期的自然環境經驗依據發展歷程，再粗略分爲覺知自然環境、產生情感連結，以及循序漸進地建立自我效能感。

1. 兒童青少年時期的自然環境經驗

(1) 覺知到自然環境，產生情感連結

雖然環境認同的發展是一個終身的過程，但基本上學者們一致肯定兒童時期是最關鍵的時刻¹⁴。環境認同的產生，始於

¹³ L. Chawla, "Growing up green: Becoming an agent of care for the natural world",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rocesses*, 4:1 (2009), pp.6~23.

¹⁴ E. Kals & H. Ittner, "Children's environmental identity: Indicators and behavioral impacts", in S. Clayton & S. Opatow (Eds.), *Identity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3), pp.135~157.

開始留意周圍的自然世界，不再將其視為理所當然，這可能來自對動物、天氣現象或季節的觀察，或開始對特定地方和自然生物產生情感性的依戀¹⁵。在這階段，「好奇心」能夠扮演重要的角色，而各種感官的探索運用，會幫助兒童由外而內建立與自然環境的認同。因此，若能為兒童營造一個可以自在享受探索的時間與空間，讓兒童與玩伴們能在自然場域裡翻動泥土、觀察昆蟲、聽落葉和雨的聲音.....不僅能激發創造力，更是他們與周圍環境建立關係的重要起步。

這種感官的探索，可以產生環境美感經驗（environmental aesthetic experiences），進而引發各種情緒感受，如愉快、放鬆、享受、緊張、恐懼等等；如果是登山或荒野型的探索活動，甚至可能產生敬畏感或崇高感，讓人意識自己在宇宙存在中的渺小，類似一種宗教經驗或神秘經驗¹⁶。在這些感受當中，負向與正向的情緒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例如許多學者認為「恐懼」可以是激發好奇與挑戰的管道。像是Chawla與她的夥伴針對三個環境體驗營隊的參與者所作的持續性調查訪談¹⁷中，幾位參

¹⁵ E. Kals, D. Schumacher & L. Montada, "Emotional affinity toward nature as a motivational basis to protect nature",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31:2 (1999), pp.178~202.

¹⁶ Valéria Ghislotti Iared, Haydée Torres de Oliveira & Alan Reid, "Aesthetic experiences in the Cerrado (Brazilian savanna): contributions to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ractice and research",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 23:9 (2017), pp.1273~1290.

¹⁷ C. C. Williams & L. Chawla, "Environmental identity formation in non formal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rograms", *Environmental*

與者紛紛表示克服恐懼是他們環境認同成長的重要因素，他們分享了如何克服對蛇和蜘蛛的恐懼，並肯定這過程加深了他們作為環境行動成員的能力感。

在與自然連結的情感層面，越來越多學者注意到「同理心」的重要性。為發展人與自然萬物之間的「同理」之情，「擬人化」的方法常被運用在兒童階段的环境課程裡。例如 Milton¹⁸認為，人們可以在諸如太陽、風、雨、風景和所有動植物等自然萬物中感受到人格感（a sense of personhood），這人格感會加強兒童對環境的認同，在環境教育方案中可以善加運用，就如我們常在環教宣傳海報上使用「地球生病了」、「大地的控訴」等標語，都是擬人化的表達。這部分我們很容易可以聯想到聖方濟在〈太陽歌〉中將萬物稱為弟兄姊妹。為聖方濟來說，這不只是一種「擬人化」，而是深刻地經驗天主是創造萬物的父；在祂內，我們與自然萬物共同分享了手足般的受造生命。儘管人與其他生物具有不同的價值與特徵，但在創造內，我們享有「若是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都一同受苦」（格十二 26）的親密連結關係。

(2) 循序漸進地建立自我效能感

為使兒童與青少年在覺知自然環境後，能進一步產生負責任的環境行動，Chawla等人引用Eccles和Wigfield的期望價值模

Education Research, 22:7 (2016), pp.978~1001.

¹⁸ K. Milton, *Loving nature: Toward an ecology of emo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2).

型 (expectancy-value model)¹⁹，提醒我們必須留意不同年齡段兒童的價值傾向：為幼兒而言，活動的興趣與享受價值是最為重要的，這時成年人可以帶兒童到自然場域中進行遊戲和探索；到小學初期，效用價值開始受到重視，這時可以根據兒童的環境行為表現，給予不同的激勵與獎賞；當兒童的自我認同逐漸發展之後，成就價值就顯得突出了，可以鼓勵兒童或青少年參與不同的社會群體，並在群體中學習解決環境問題、投入持續性的實踐。

與此相似的，環境教育學者Sobel²⁰提出「環境責任的階梯」理論 (ladder of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他主張在兒童早期，成年人應該藉由探索自然的活動，來培養孩子們在自然地區中的舒適和愉悅感，像是帶孩子收集如岩石或鮮花，或慶祝季節變化等。到小學後期，成年人可以通過園藝、堆肥、為野生動物創造棲息地，或展開學校回收計畫等活動，幫助孩子發展身分，成為地球的良好管家。Sobel認為，只有在兒童建立了環境認同和自我效能感的基礎之後，才合適引入氣候變遷等可能產生壓迫性挫折感的問題。至於中學之後的階段，可以開始讓青少年們認識到他們對環境問題所選擇採取的行動是至關重要的，例如在學校裡組織氣候變遷小組以減少學校的碳排放等。

¹⁹ J. S. Eccles & A. Wigfield, "Motivational beliefs, values, and goal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3 (2002), pp.109~132.

²⁰ D. Sobel, *Childhood and nature* (Portland, ME: Stenhouse Publishers, 2008).

讓兒童與青少年參與社區的環境行動，可以幫助他們建立自我效能感並培養能力。某些環境計畫只讓兒童作為旁觀者，或只有選舉青年代表參與會議的有限權力，Chawla 等人認為這類型的參與程度是「膚淺」的，兒童與青少年在這樣的過程中成長有限。他們肯定，如果能讓兒童掌握至少部分計畫以及自主決策的權力，兒童的學習就會展開。

此外，除了建立自我效能感，Chawla 的研究團隊強調，在應對環境挑戰時，「集體效能感」往往能發揮更大的作用。集體效能感指的是群體成員的信念，相信「他們可以通過一致的努力解決所面臨的問題，並改善他們的生活」。群體效能感與自我效能感息息相關，一個群體的能力取決於個體成員的技能和承諾；反之，群體中的個體也會從因著肯定自己屬於一個運作良好的群體，而獲得力量。為有效面對環境問題，我們需要個別與集體效能感的雙重運作。

2. 重要他人與社群的影響

幾乎所有重要生命經驗相關的研究，都看重重要他人的影響。在綜合分析當前兒童與自然連結的研究後，Chawla 指出在不同的生命階段中，重要他人的身分會有所變化。在童年早期或中期，家庭中的成年人嘗試通過間接的方式來吸引孩子對自然元素的關注。例如在Chawla進行的訪談中，一位致力於保護野生溪流的生物學家回憶到她的母親在她小時候採摘漿果的經驗，另有一位環境教育工作者記得童年時祖父和媽媽讓他可以

自由命名灌木叢中的野花。Matthews²¹ 稱這樣的間接經驗是一種注意力的傳染態度 (contagious attitude of attentiveness)，成年的重要他人藉著榜樣來傳達關心自然的重要性。這種共同關注的過程 (processes of joint attention)，對於孩子來說至關重要。Chawla²² 認為，當一個兒童和生活中的重要他人一起注意到自然界的元素，能夠停留下來欣賞自然本身的存在、而不是恐懼或破壞時，自然的內在價值就在他心裡奠定了基礎。

在童年晚期和青春期，關鍵性的人物與活動開始走出家庭，這時候，他們逐漸參加一些正式的活動，如童軍夏令營、環境營隊或學校的科學課程，在這當中，教師、童軍領袖和親密的朋友將對他們產生重要的影響。到成年早期，大學教授、同事或導師則可能進一步幫助他們將自己的興趣和技能投入於環境行動或志願服務中。

三、從基督徒信仰省思人與自然連結

(一) 從信仰角度看人與自然關係的破壞

1960 年代國際環境問題初現檯面之際，歷史學者Lynn

²¹ J. R. Matthews, "Adult amateur experiences in entomology", in J. Adams ed., *Insect potpourri: Adventures in entomology* (Gainesville, FL: Sandhill Crane Press, 1992), pp. 321~328.

²² L. Chawla, "Childhood experiences associated with care for the natural world", *Children, Youth and Environments*, 17:4 (2007), pp.144~170.

White在國際科學期刊*Science*發表〈生態危機的歷史根源〉²³，直指猶太基督宗教具備強烈的人類中心思想，乃是全球生態危機的肇因。在《願祢受讚頌》通諭中，教宗面對Lynn White批判，坦誠「基督宗教的人類學論述不足，曾造成一種對人與世界之間關係的錯誤了解」²⁴，並回歸聖經《創世紀》文本，重新指出聖經要求人耕種及看守樂園的目的，是為表明人類和大自然之間具有相互責任的關係，如果有人據此將人的管理責任視為具有操縱性和破壞性的，便不屬於教會對聖經所認知的正確詮釋²⁵。

基督宗教傳統慣從「託管」(stewardship)角度看待人與自然的關係，肯定造物者賦予人類管理萬物的職責。儘管託管理論強調人類不是主人而是管家，但這樣聚焦在管理權的論述，不小心就可能流於傳統人類中心主義對環境的掌控與操縱觀。在《願祢受讚頌》中，教宗顯然更重視人與自然萬物之間手足情誼式的「團結關懷」，更甚於管理職責；後者的關係出於責任，前者同樣肯定責任，卻帶出更深的連結，而這連結即是人性尊嚴的基礎——它是在與神、與他人及與萬物的交織互動中實踐的，當其中一環出現病徵時，則三者的關係都同時受到損傷。

綜而言之，方濟各認為《創世紀》以象徵性及敘述性語言

²³ Lynn White Jr.,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 Crisis", *Science*, 155 (1967), pp.1203~1212.

²⁴ LS 116.

²⁵ LS 67.

描繪出的圖像，其實是爲了表達人生命的基礎，它建立在三個相互交織的基本關係上：與天主的關係、與近人的關係，以及與大地的關係²⁶。這三者關係的本質，即是創造者與受造者，以及受造者彼此間的連結。在這樣的脈絡下，面對今日罹患「大自然缺失症」、「失去山林的孩子」，我們不可僅以單一社會環境現象、或僅以醫學性的病徵來理解，必須回到信仰的根基，看見當人疏遠於自然關係時，其內裡有更深刻的神學意涵：當人疏遠於自然，人與神的關係也會遭受損傷；當人再無法欣賞自然之美，甚至以機械性、掌控性的方式面對自然時，這三個基本關係就會遭受破裂，也就是遭到「罪」的破壞。

（二）朝向生態皈依：將自然連結於基督徒的使命意識

面對環境危機底下盤根錯結的罪的結構，教宗提醒我們不可只停留在資訊蒐集以及解決問題的層面，必須更深入「人」身分的核心，敢於自我詰問更深入的生命課題：我們生存於世的意義是什麼？我們工作和奮鬥的目標是什麼？地球需要我們爲她做什麼？這些詰問逼近我們身分認同的核心²⁷。可以清楚地看到，通諭對當前環境教育的期待與生態心理學、環境人類學者們所倡議的「發展環境/生態認同」不謀而合：惟有當人將其與環境的連結納入其身分認同之中，將環境關懷視爲其身分使命，否則人與環境的關係無法獲得持續性的發展。

²⁶ LS 67.

²⁷ LS 160.

爲對人的身分與生命課題有革新性的認識，教宗呼籲我們，所有人必須興起一種「果敢的文化革命」，讓生態危機成爲一種號召，召叫人深度的悔改，以整合的方式活出人與耶穌基督相遇的成果，在人地關係中展現基督徒的使命²⁸。這樣面對環境危機引發的悔改，稱之爲「生態皈依」，最早是由先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所提出，從 1979 年頒布的《人類救主》通諭到 1991 年的《百年》通諭，他察覺到人類發展必須納入必要的倫理條件，要求對人完全的尊重，同時也關懷四周環境。教宗方濟各承襲若望保祿二世的思想，在《願祢受讚頌》中進一步闡述個人與團體性的生態皈依的意義：

「生態危機是一個號召，叫人有內心的深度悔改。……生態皈依使人與耶穌基督相遇的成果，能顯示在他們與周遭環境的關係中。活出我們的使命，而成爲天主化工的保護者。是個重要的生活美德，絕非可有可無或次要的基督信仰經驗。²⁹」

爲達致這樣的整體皈依，我們必須審視自己的生活，承認自己的錯誤、罪過、缺點和失敗，坦承自己的行爲並不再以任何行動傷害天主的受造界³⁰；同時要培養各種德行，例如柔和溫婉、慷慨關懷，以及感恩和施予。我們要承認世界是天主愛的恩賜，由內而外地意識我們與自然萬物的連結，以更大的創

²⁸ LS 217.

²⁹ LS 217.

³⁰ LS 218.

意和熱忱來承擔來自信仰的責任與使命。這樣的皈依，不只在一切幅度上避免了個人主義的危險，更需團體網絡式的合作參與³¹，以一種手足情誼的方式體現真正的團結關懷精神。

（三）藉由信仰培育重建人與自然的連結

為促進個人與團體性的生態皈依，教宗呼籲我們當擴展環境教育的目標，並發展新的教學法：

「環境教育也尋求重新恢復各個層次的生態平衡，建立人與自己內在、與他人、與大自然和與其他受造物，以及與天主的和諧。環境教育應朝向促成超越的躍進，因而賦予生態倫理最深刻的意義。我們需要能夠促進生態倫理發展的教育家，透過有效的教學法，協助人們成長於精誠團結、承擔責任和憐憫關懷的氛圍中。³²」

若要使人與自然的關係重新納入人類身分認同的發展，在基督徒的信仰培育裡，連結環境關懷成為刻不容緩的要務。我們需要循序漸進地在各級要理講授中，加深慕道者與再慕道者的基督徒認同與環境的連結；並在各青少年團體的信仰培育營隊活動中，強化教友青少年社群環境行動的意識。相信如此將能啟動地方教會朝向生態皈依的動能。

我個人並不具備教理講授的經歷，在此嘗試參照環境教育中「與自然連結」（CWN）相關生命經驗研究成果，提出一些

³¹ LS 219.

³² LS 210

可能的方向，還需請直接投入第一線教理與信仰培育的教會夥伴們，給予實務上的指教與建議。

根據環境認同發展理論，兒童階段是人與自然連結關係建立的核心時期。在這時期，父母可多帶孩童參與野外活動，在自然中陪伴孩子觀察、欣賞各種動植物，藉由「注意力的傳染態度」，讓孩子也能夠發現自然界的美，並適時地和他們一起感謝讚美創造自然萬物的天主，讓孩子們知道天主因著愛而創造萬物，而我們每個人、每個生命的存在都是被愛的。這方面，也可以藉由聖方濟的太陽歌，帶領孩子們體會萬物都是我們的弟兄姊妹，天主藉由祂所創造的萬物照顧我們，我們也要學習付出關懷。

另一方面，在主日學課程裡，也可以嘗試讓兒童們藉由不同的感官來接觸、體驗堂區內的動植物，並讓兒童用不同的方式來表達、展現他們所觀察到的自然，如繪畫、表演等等。堂區可以舉行親子共融的戶外活動，不僅加強家庭間的交流，也給予兒童們在自然中與同伴一起遊戲的經驗。如果有舉行堂區兒童夏令營，除了自然體驗外，也需要在生活常規上循序漸進地幫助孩子建立尊重資源的生活習慣，如最基本的節約用水、省電；到高年級後，可以開始加入資源回收、減塑等課程。

在中學階段的青年會裡，青少年需要開始建立自我與群體效能感。這時期的同儕影響力較大，可以藉由不同的體驗探索與任務活動，讓堂區的青少年發展自我潛能，同時也建立團隊默契，並學習合作。在營隊的戶外活動裡，可以加入探索與挑

戰的要素，讓青少年以團隊的形式去發現問題，並找到解決方法；更好的是在例行性的青年會時間中，慢慢帶領青少年對於環境問題的敏感度，例如看到堂區的資源回收、節能減碳問題等等。

在我曾經有過的經驗中，帶領青少年進行海岸淨灘，能夠是團體環境行動展開的起點。我們運用國際淨灘行動紀錄表來登記，並檢視海洋垃圾問題，也同時加入關於「創造」與「罪」的默想，從而引發青少年認識生活中舉手製造的垃圾對環境能帶來多大的傷害，讓青少年覺知意識個人行為的環境後果；而後在團體的聚會中，持續地彼此叮嚀提醒，慢慢形塑一種集體性的環境關懷文化。

在為青年舉行的冬夏季營隊裡，可以藉工作坊來進行不同類型的環境探索。例如將徒步朝聖連結於自然體驗，在徒步中留意個人身體與外在世界的關係，以不同的感官來重新發現日常生活中習以為常的創造奧蹟；另外，亦可藉由多媒體或戲劇等多元的方式，讓學生們針對不同的環境議題進行討論、練習角色與立場的轉換、學習蒐集資料與分析、訓練民主思辯與論述的能力。很重要的是，需要讓我們的青少年、尤其是大專青年開始認識教會的社會訓導，在信仰的基礎上，學習對國際政治、經濟、社會與環境結構進行省思與批判，在深化基督徒價值的同時，也拓展並持續開放視野。

總 結

大部分的環境教育理論，聚焦在環境態度、知識與行為的

培養；直到 1990 年代，在生態心理學的發展帶動下，開始有不同領域的學者關注「人與自然連結」的意義與內涵，也將之連結於環境認同的發展建構。儘管「人與自然連結」的概念至今仍在一個變動展開的歷程，但其回到「人」的身分根源來看待人與環境的關係，可說與基督信仰在探討環境問題時，對天人、人人及人我關係的強調不謀而合，是可以相互補充參照的學說。

環境認同、與自然連結的概念，幫助我們確認除非將環境關懷納入基督徒的身分與使命之中，否則一切環境行動只能是外加於人的責任與義務，無法促成真正關鍵性的轉變。此外，在基督徒的環境教育發展上，生命經驗的研究為我們勾勒出一幅環境認同發展的歷程簡圖，讓我們能藉以省思為不同年齡階段的兒童與青少年，當給予什麼不同的自然經驗。

本文嘗試向教會內的夥伴們綜合略述「與自然連結」相關的理論發展，也初步將之連結於基督信仰、特別是《願祢受讚頌》中對人與自然關係的描繪。然而，這僅是一拋磚引玉的開始，期待有更多基督信仰內的夥伴，特別是實際投入信仰培育與環境關懷的弟兄姊妹們，能夠根據個人不同的實務經歷，為本文觀點提出修正與建議，更為能夠促發一種「向超越躍進的環境教育」而共同努力。